

破解制约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

□ 王 蕴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在疫情防控措施到位前提下，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产，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消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加快升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直接体现为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由“从无到有”向“从有到好”迈进，体现为消费需求更趋品质化、多样化和服务化。但由于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消费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堵点”和“痛点”。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打通“堵点”和消除“痛点”，有利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消费增长的趋势与特点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逐步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服务化、品质化和多样化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反映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超越了功能性需求而上升到体验性、享受性需求层次。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达到45.9%。在此背景下，我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巨大国内市场优势将不断显现。

消费下沉趋势日益明显，消费发展协调性增强。近年来，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越来越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消费下沉特征更加明显。数据显示，2006年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为1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为30.7%；到2017年，人口占比提高到15.5%，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却降低到28.8%，下降了1.9个百分点。同时，城乡消费市场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农村消费市场增速持续快于城镇。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增长9.9%，增速比城镇高2.4%；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60332亿元，增长9.0%，增速比城镇高1.1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比达到14.66%，比上年同期提高0.16个百分点。

重要消费市场进入发展新阶段，线上线下消费格局基本稳定。我国汽车消费已经进入城镇置换升级与农村普及消费并重的“二元结构”特征。2018年我国千人汽车拥有量约170辆，按照日韩汽车消费发展经验，汽车保有量从150提高到250辆、500辆，年均增速将大幅降低。2019年二手车交易量近1500

万辆，新旧车交易比达1.73:1，表明置换升级需求成为支撑汽车销售的重要力量。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汽车消费市场总体保持高位低速增长态势。随着城乡居民家电拥有量的大幅提高，家电消费整体从快速普及进入到更新升级的发展阶段。此外，随着互联网流量红利消减，网络购物覆盖人数、访问次数等数量扩张速度不断放缓，网络购物等新消费模式已经由快速扩张阶段进入到稳定增长阶段，对消费增长边际拉动效应趋于稳定。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趋势性增强。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由生产者主导向消费者主导、由生产推动到消费拉动的特点。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动呈现“U”型变化态势，消费率于2011年开始趋势性回升，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趋势线回升态势。2019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1.0%。这充分说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符合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特点，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正在形成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

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堵点”和“痛点”

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要求相比，由于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短板，也影响了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更好发挥。

消费能力持续提高面临压力且消费意愿有所下降。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增长实际增长5.8%，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与“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相对应的中等与中等偏上户的收入名义增速不仅显著滞后于同期经济增长水平，而且也明显慢于其他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乏力导致消费能力提高受限。此外，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从2013年72.2%下降到2019年70.15%。2019年，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5.5%，较收入增长少0.3个百分点。这些都表明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支出持续下降，居民消费意愿在降低。

国内供给不能有效适应消费升级需求。这既表现为适应消费升级需求的新兴服务和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部分消费意愿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消费外流；也表现为低端供给相对过剩，供给效率效益较差，供给体系尚未与需求体



系形成良好匹配关系。我国健康、养老、托幼、旅游和文化等领域服务供给缺口问题长期存在，质量偏低和体验不优等制约了居民升级型消费需求。《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2017—2018）》显示，接近60%的出境游客在出行前拟定购物清单。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达2500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消费者不仅大量购买国外奢侈品，而且还大量购买奶粉、婴幼儿用品、化妆品护肤品等一般消费品。

安心、放心和舒心的消费软硬环境建设有待加强。消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不适应消费升级发展需要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在一些新兴城镇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现代商业服务设施不完善，宽带网络设施落后、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等问题。农村地区的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水平低、条件差，制约了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有效满足。消费质量标准不健全或国内标准低于国际标准的问题仍较突出，旅游、养老、家政、餐饮等服务领域缺乏统一行业服务标准。消费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价格歧视、不公平竞争、垄断经营、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假冒伪劣等现象时有发生。

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

以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出发点，以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依托，应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

以提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等收入群体是支撑消费升级和消费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促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均衡的重要推动主体。应加快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面向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劳动者，健全收入激励机制。以政策松绑为重点加大对创新人才和团队的支持力度。加快改革事业单位

工资总额限薪管理制度。允许对特定科研人员群体采用年薪制、股权期权激励、特聘岗位津贴等方式，促进收入适度多元化。鼓励企业采取协议薪酬、持股分红等方式，加大对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力度。

着力鼓励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一方面要加强产品标准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补齐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的短板。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建立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主体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培育形成一批展示中国产品和服务优质形象的品牌和企业。及时研究制定完善有关服务行业的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商业模式等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要健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产品和服务多样化供给。落实全国统一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及其年度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非禁即入”，发展富有效率 and 活力的市场主体，确立法人主体平等地位。

多措并举改善消费软硬环境。一方面，要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进一步吸引社会投资，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现代流通、信息网络、服务消费等短板领域基础社会建设，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应加快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覆盖线上线下企业及相关主体的信用信息采集、共享与使用机制，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探索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信用信息查询服务和消费预警提示。此外，应探索建立消费者互动型监管体制。建立政府、消费者、企业和中介机构等多方参与的消费共治体系，完善消费者和社会监督评价机制，健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安全风险或顾客满意度监测评估体系。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时指出，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里，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大”，二是“加大”，三是“持续”加大。这一表述应该如何认识？同时，如何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底气到底从何而来？

目前看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加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个多因素、多维度、巨系统的超级复杂体。具体而言，大致包括：一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两者交织，相互影响。二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各种自然灾害、地缘政治摩擦等；而且，非经济因素影响时常大于经济因素影响。非经济因素引致的风险时常向经济领域传导。三是经济实际因素和心理预期因素。现在看来，开始出现心理预期影响大于经济实际影响的情形。四是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国际因素，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中国打上半场，国外打下半场”，国外输入风险加大。五是“灰犀牛”事件因素和“黑天鹅”事件因素。后者，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六是风险因素和机遇因素。风险之中存在机遇因素，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危中有机”可有多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健康医养、中医崛起、数智转型、价值改变、举国体制、制度优势、中国速度、精准治理、协同时代……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可从多重视角具体展开。一是从世界趋势看，中国处于上升时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必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所作为，逐步从全球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转变为引领者和贡献者。二是从当今时代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引领世界作用，而且正在具体践行之中。前一时， “一带一路”倡议；当前时期，中国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再次走在世界前列，可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展现良好心态、良好预期。三是从经济增长看，全球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但是，中国应对措

当前经济如何『看』

□ 李海舰

施及时、到位，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出，提振信心、提振经济。四是从经济韧性看，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韧性十足，包括工业体系完整、地域层次多样、居民储蓄率高，等等。而且，越是困难时期、危机时期，制度优势、举国体制、政府作为更加突出。五是从中国智慧看，中国人民具备了处理复杂问题的高维智慧。即：当经济处于上升（过热）阶段，多一份警惕；当经济处于下行（衰退）阶段，多一份信心。其具体表现为，形成了一整套成熟完善的“逆周期调节”思维和工具。六是从转型发展看，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就开始了颠覆性的改变。不仅看增速，更要看质量；不仅看规模，更要看结构；不仅看经济，更要看民生；不仅看现在，更要看未来。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复杂，剩下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非常繁重，局部地方、有的方面还有薄弱环节和工作不足。反贫困已行进到一个更为艰难的领域，脱贫攻坚攻坚战的重心将从绝对贫困逐步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而言，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寻求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也就成为其中应有之义。

持续擘画政策减贫的发展机制。一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政策的连续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状况，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以及商品流通体制，拓宽贫困群体持续增收；完善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和灌溉设施，发展文教卫生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为随之开展的相对贫困治理事业提供条件。二是保持救济性扶贫政策的稳定性。开发公益性扶贫岗位和发展型保障项目，以“服务购买”的形式赋予农户以小型工程就业岗位，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并给予贫困农民必要的收入。三是坚持保障性扶贫政策的整体性。加强保障性扶贫政策的统筹安排和政策设计，创新多样化的政策保险保障扶贫，防范贫困群体的人身、财产风险，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四是坚持能力发展性扶贫政策的灵活性。着眼于“人的发展”为中心所需的长效机制建设，根据贫困人

积极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陈桂生 尚凯莉

口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及其能力，针对性地采取给予资金、技术、资源、机会等支持措施，促使其经济和权利的多维发展。

夯实多元化的产业益贫机制。产业是带动贫困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使得贫困群体收入增加幅度或速度高于其他群体，那么缓解相对贫困才是可期的。一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充分依托本地区特定的气候、资源等客观实际，按照优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要求，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走特色化益贫道路；基于品牌的打造不断推进“原产地”特色的益贫产业。二是加强做实农产品加工业的资源对接。将农业产业链梯次提升至二、三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加快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形成以市场带动农村产业益贫模式；打破农村个体农户分散经营的现状，培育以特色农产品经营的社会企业、股份制合作社、经济能人等，因地制宜地对“企业、基地、协会、以及农户”等核心要素进行系统配置和组织化益贫的模式。三是发展符合本区域文旅资源和慢生活的旅游产业。依托特有乡风民俗、历史资源、文物古迹等文化财富，发

展特色旅游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的农业融合，从而形成多产业共生互促发展模式；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促进乡村经济再生，将乡村产业打造成为持续增收的“长效之源”，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相对贫困问题。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是考察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变量，也是相对贫困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赋权和能力发展层面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补足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继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的力度，相应提高贫困群体的教育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针对较为普遍存在的健康匮乏与因病致贫问题，在进一步提高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水平的同时，适时推进医保和预防工作以提高贫困群体的健康水平；加速推进综合性村属文化设施管养，弘扬民风民俗，满足低收入群体日益发展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道路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村路网结构以满足人流物流的交通需要；夯实农村水利工程配套机制，保证欠发

达地区饮水安全以及农业灌溉；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完善房前屋后植被绿化，增强农民居住条件的舒适性。简言之，不断营造良好的农村生活环境并提升生产生活条件，是保障贫困群体拥有高阶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可能的重要途径。

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力的自觉机制。从主体性上讲，贫困群体是相对贫困问题解决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核心要素。因此，制度化地激励其自主性和积极性以持续推动中国的减贫事业，是真正触及相对贫困问题实质的政策工具集。一是引入竞争激励机制。通过生产奖补、项目补助等激励措施与贫困群体利益挂钩，对具有脱贫积极性与脱贫成果显著的家庭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并对习惯性依靠政府的“因懒致贫”群体进行必要的物质剥夺，逐步改变其“等、靠、要”惰性思想。二是鼓励需求导向的“点穴式”技术培训。如根据贫困户实际需求，精准开展面对不同岗位导向的系列就业技术训练。基于此，持续着力于提高群众脱贫致富的自身素质与基本技能，稳定贫困群体就业使其持续获得“脱贫之技”并走上稳定脱贫之路。三是引导群众树立

自主脱贫致富意识。通过宣传脱贫致富典型以及弘扬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标杆模范作用，激发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观意愿，增强自主脱贫的内源激励使其自觉参与到自我脱贫和减贫实践中去。

建立于预防代际贫困传递的阻隔机制。针对贫困群体所处不同年龄段的特点，提高贫困对象瞄准率，采取“父代救助、己代增收、子代教育”的因人而异的减贫策略以阻隔贫困传递，从代际的维度减缓相对贫困的固化。一是完善父代救助。对于丧失劳动能力或年纪较大的贫困群体，政府应完善养老、医疗等保障性政策，给予其“应保尽保”救济，使其能够老有所依，避免给予子女形成过度负担。二是鼓励己代参与。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积极参加到创造财富的社会活动中去，通过政府提供的岗位、技术、资金等带贫资源的“乘数效应”，不断提高其劳动参与积极性与创收自主性，抑制其落入道德陷阱的逆向选择性可能行为。三是加强子代教育。重视教育的重要性，以防止贫困在子代的延续来切断代际性到长期贫困，通过财政补贴等系列政策吸引贫困家庭中的适龄青少年就学，降低贫

